

康熙帝推崇唐诗的“文治”象征意义

于翠玲 刘冰欣

内容提要：康熙帝在实施文治的背景下，通过多种形式学习唐诗、推崇唐诗，试图建构融洽的君臣关系，确立符合“正声”的诗歌标准，而排斥不加节制的情感抒发，具有明确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帝以唐太宗自比，效法唐代盛世，这种特殊的阅读心态，与一般文人纠结于唐宋诗之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关键词：康熙帝 唐诗 文治 诗教

关于清代的唐宋诗之争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康熙帝对唐诗的推崇及其对文人的影响。本文借鉴阅读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康熙帝是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样的阅读心态，通过什么方式或仪式来推崇唐诗的。下面仅结合相关史料，从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取法唐代，以诗赋取士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下谕特设博学鸿词科，征召“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这成为其标榜“崇儒重道”^①、实施文治的重要举措。康熙十八年(1679)考试举行，内容为一篇《璿玑玉衡赋》和一首五言《省耕诗》。关于这次博学鸿词科的具体情况和意义不再赘述，只是强调博学鸿词科以诗赋取士的形式，与康熙帝在这一时期阅读唐诗、效仿唐太宗有内在联系。

自康熙十六年(1677)起，康熙帝开始大量阅读唐诗，并有意自比唐太宗，有关史料下面再论述。为了说明康熙帝推崇唐诗不只是个人吟咏性情所至，而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这里不妨先举出康熙帝在两篇御制总集序文中所表达的理念。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所作《全唐诗序》，就提到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的意义：“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废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宴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②康熙

^① 《清实录(四)·圣祖实录(一)》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0页。

^② 圣祖御制、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3页。

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在《四朝诗选序》中再次说明唐诗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世之论诗者,谓唐以诗赋取士,故唐之诗为独盛。夫唐之诗诚盛矣,若夫宋之取士,始以诗赋,熙宁专主经义而罢诗赋,元祐初复诗赋,至绍圣而又罢之,其后又复与经义并行。金大略如宋制。元自仁宗罢诗而存赋。明则诗赋皆罢之,士于其时以其余力兼习有韵之言。……朕夙兴夜寐,永图治安,念养士育才,国家盛典,考言询事,曩代良规。亦既试之制艺,使通经术;兼以论、表、判、策,俾达古今;而于科目之外,时以诗赋取人。每当省方观民之会,士之所进诗赋古文,止辇受观,停舟延问,亲试而拔其尤者亦多矣。”^①这篇序文全面梳理了唐代至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说明本朝参照唐代“良规”而采用“于科目之外,时以诗赋取人”的方式。

这两篇序文可以看作康熙帝对已经实施的取士制度的回顾和肯定。而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的博学鸿词科,正是其效仿唐代“用声律取士”“以诗赋取人”的结果。在清初开始转向文治的特殊背景下,康熙帝作为一个满族皇帝,采用唐代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招揽文士,所谓“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坛,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之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②据记载:对这次考试的几份答卷康熙帝与阅卷官有过讨论,“上曰:诗赋韵亦学问中要事,赋韵且不论,即诗韵,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并问“此何说也”。阅卷官的回答是“此缘功令久废,诗赋非家弦户诵,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康熙帝予以认同。^③由此可知,康熙帝此时已经掌握了诗赋文体及韵律知识,但这次考试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对诗韵方面的失误也就宽容放过了。尽管如此,康熙帝采用“时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必然会影响一代文人的诗文风尚。

效仿唐太宗,政治文翰相兼

康熙帝本人是在汉族文臣的熏染和教导下成长的,其中经筵会讲起到重要作用。而日讲书籍中也包括《诗经》,其作为诗教的源头,为康熙帝日后引经据典、阐述诗教提供了坚实基础。杨念群指出:“到了康熙帝时期,帝王对经典的态度可谓风格大变。”康熙帝把经筵会讲当作一种文化仪式,自康熙九年(1670)开始正式经筵日讲,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开始又下令改间日进讲为每日进讲;康熙十六年以后又改变了经筵的方式,“任由康熙或讲全文,或讲其中一节,然后再由讲官进讲。这样一来,帝王和讲官的角色就被彻底地颠倒过来了”^④。这种

①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169页。

② 《清实录(四)·圣祖实录(一)》卷七一,第910页。

③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8页。

④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97-98页。

“教化角色之逆转”的情况在康熙帝学习唐诗的过程中同样存在。

康熙十六年十月,康熙帝始设南书房,以侍读学士张英、序班高士奇等人入直,在讲读经书之暇,也学习诗文。而对康熙帝学习唐诗最有帮助者是高士奇,康熙帝曾评价:“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五经而已。……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逐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①作为康熙帝的侍从词臣,高士奇不仅讲授诗文,还讲授来自《诗经》注疏的“观风”理论,强调诗文的内容反映了不同朝代的特点。

根据《南书房记注》,康熙在开始阅读唐诗的阶段,就对唐太宗的诗歌有很高评价: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未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谕曰:朕于经史之暇时阅唐诗。前代帝王,惟唐太宗诗律高华,朕亦常于宫中即景命题,以涵泳性情”;高士奇的回答是:“从来政治文翰难以相兼,今皇上勤民听政,日理万机,又于经史词翰无不究心,诚前代之罕见也。”^②康熙帝称赞唐太宗,虽是就诗歌而言,却符合其帝王的身份;高士奇也顺势引导,从帝王为诗的角度,提出政治与“文翰”的关系,实际上隐含着正面说教的意思。《南书房记注》记载这一个月康熙帝有多日连续阅读唐诗,还展示了自作的诗歌,而高士奇的评点也不忘点拨“帝王立言之体”。例如,二十七日:“上以御制《咏雪》七言绝句诗一首、《景山看雪》五言绝句诗一首示臣士奇,因奏曰‘臣得恭睹圣制二章,气象宏伟,词语高华,深得帝王立言之体,即偶然词翰,可以仰观圣度矣。’”^③此外,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上幸黑龙潭,命臣英、臣士奇扈从,上于马上御制《同大学士明珠、侍卫等幸黑龙潭途中》诗一首,赐臣英、臣士奇敬观,臣英等奏曰:皇上御制诗,声调乃盛唐元音,而悯念农人,形于歌咏,益见皇上不忘稼穡艰难之至意也。申时,上幸卧佛寺,召臣英、臣士奇至御前,赐观御制游览诗三章,情景天然,气格高古,于前代帝王中比之唐太宗更为精拔。”^④实际上,这次御制四首诗只有第一首中的“暑中荷锄方知苦,停辇观苗问稼人”^⑤两句值得一提,其余都是即兴写景之作,张英、高士奇却同声赞许:一是其声调乃“盛唐元音”,而内容“悯念农人”;二是将其比为唐太宗。可以说,唐太宗作为盛世帝王的形象,是一个有政治寓意的符号,既表达了康熙帝对其自觉效仿的心思,也反映了侍读文臣对康熙帝的有意期许,君臣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经过一段时间对唐诗的学习,康熙帝的角色

① 高士奇:《蓬山密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8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② 王澈整理《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⑤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257页。

发生了转变,很快掌握了对诗歌进行解读的话语权,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未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阅唐诗。因谕曰:诗以吟咏性灵,如唐太宗诸篇,未有不以天下黎民为念者。因复诵其诗至三十三首,一字不遗。”^①这种解说及复诵功夫,不仅使康熙帝日后可以得心应手地用唐太宗原韵作诗^②;更重要的是使其有意效仿唐太宗,标榜“以天下黎民为念”的政治情怀,而超越了个人即兴抒情的局限。

康熙十七年,康熙帝特设博学鸿词科,不少文人被官员举荐,从各地聚集到京城,而次年博学鸿词科开考,试题之一的《省耕诗》就是要应制表述古代帝王巡视农耕的内容。这样的题目恰恰表达了帝王“悯念农人”的意思,应该与康熙帝当时学习唐诗有一定关联。此外,唐太宗是一个后代君臣都能认同的正面符号。唐太宗时期编修了多部史书,主持者如魏征等都是当朝的重臣,他们也从朝政得失、君主好尚的角度,评述文学风气的变化,将君主好尚淫靡文学看作是梁、陈、隋覆亡的重要原因,所谓“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③强调“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④由此看来,高士奇在向康熙帝讲读唐诗时,委婉提出“从来政治文翰难以相兼”的话题,应该是有深意所在的。康熙帝虽喜爱唐诗,也要顺着诗教的思路加以解释,才能获得正统的话语权。

书赐唐诗,修举文教

康熙帝在日讲经书的间暇,以学习诗文、书法作为儒雅风范。康熙十六年,他曾对日讲官说:“治道在崇儒雅……今四方渐定,正宜修举文教之时,翰林官有愿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进呈者,着不时陆续送翰林院进呈。”^⑤而他选拔的侍从文人都是在诗文及书法方面特别优秀、能够随时应制的,高士奇就是因为“博学善书”而入直南书房的。这种君臣之间就诗文书法进行的交流活动,也是“修举文教”、展示君臣和谐关系的政治仪式。对此,康熙帝也曾举唐太宗为例,康熙十七年五月,他对大学士明珠及张英、高士奇说:“朕观古来帝王,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唐太宗之听言纳谏,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谊浹洽。故能陈善闭邪,各尽所怀,登于至治。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我太祖、太宗、世祖相传以来,

① 王澈整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南书房记注》记载,康熙十六年、十七年多次召高士奇至懋勤殿,阅读唐诗。

② 如康熙二十年(1681)作《和唐太宗咏桃花即用原韵》;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驻蹕辽阳夜深对月用唐太宗辽城望月诗原韵》《玉泉山晚景用唐太宗秋日韵》《康熙四十四年元旦用唐太宗元日旧韵》。

③ 姚思廉:《陈书·后主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9页。

④ 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7页。

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情谊常令周通,隐微无有间隔。一游一豫,体恤民情,创作艰难,立万世不易之法。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事,凜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意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也。”^①明珠等人马上随声应和,在称颂之后,表达忠诚:“臣等滥叨隆遇,或掌机密,或侍左右,日见皇上留心政治。游幸之际,未尝不以天下为念。”^②前面提到《南书房记注》记载这一天,康熙帝与张英、高士奇在谈论诗歌时称颂唐太宗,而起居注的记载则表明:康熙帝是从政治角度效仿唐太宗的,试图建立“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情谊”的融洽关系,其对身边大臣更是“常以家人父子之意相待”。而书赠诗文,颁赠大臣也是效仿唐太宗、联络君臣感情、修举文教的一种有效方式。

根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经常颁赐御书^③,其中不乏唐诗。例如,康熙十七年的一天,“上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禎入侍内庭,蒙上赐御笔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诗各一幅。以廷敬等曾赐御书墨刻,士禎未预,仍赐士禎墨刻二幅。又谕:‘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廷敬等奏曰:‘皇上圣学辑熙,翰墨精妙,超出自古帝王之上。臣等得蒙恩赐,传之子孙,真为世之宝。’”^④这次颁赐御书是对陈廷敬等人的奖励。另一记载则是书法交流: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一天,“上曰:‘宋大学士向有善书之名,可就此案作书,朕欲一观其用笔耳。’上降座立案前,观书,宋德宜书唐诗一首毕。上又曰:‘陈元龙作小楷颇佳,且甚敏捷,可就此案作大字一幅。’陈元龙亦书唐诗一首。上览毕,即亲洒宸翰,书唐诗一首。”于是,王熙、宋德宜称颂“御书墨妙,真希世之珍,得蒙颁赐一、二幅,俾臣等奉为世宝,则世世子孙皆仰沐光荣于无既矣。”^⑤其实,康熙帝与文臣交流书法是大有深意的,康熙十九年(1680),在瀛台前亭,康熙帝曾将御书大轴颁赐给大学士索额图等十八人,“谕曰:朕万几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虽好慕不衰,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非谓书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⑥这显然是一次有关“文教”的颁赐仪式,旨在营造“美恶皆可相劝”的君臣关系。

对大臣来说,康熙帝的书法是无上至宝,获得恩赐更是无上荣耀,必然要大加称颂;而为了随时应对,侍从康熙帝,更是要率先示范,广泛阅读唐诗并大力推崇唐诗。例如,陈廷敬本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366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张万兴《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政治功用》,《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36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19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64页。

人的诗歌宗法杜甫,曾被康熙帝赞许为“清雅醇厚”^①;他还编有《杜律诗话》。王士禛则推崇王维、孟浩然之神韵一派,选编了《唐贤三昧集》,后来又编纂《十种唐诗选》,并刊定了《唐人万首绝句选》。两人尽管有不同偏好,但都属于盛唐气象的一部分,顺应了康熙帝歌咏“盛世元音”的需要。陈廷敬还奉敕编纂《御选唐诗》,深得康熙帝信任。康熙帝为徐倬所进《全唐诗录》作序后,又命陈廷敬作序,陈廷敬追溯古代“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是二南之诗,得于巡狩。此周初政教之美所由传也。……洎乎有唐,太宗起而振之,本《国风》《雅》《颂》之遗,有古歌、今律诸体,上倡其鸿制,下衍其清音,彬彬盛哉!以及中、晚之际,与周诗正变,约略相仿。故观全唐之诗,愈有以知政教所关为尤重焉。”他推崇古代陈诗观风的诗教,肯定唐太宗提振诗风的作用;由此论证唐诗与“政教”的关系,并极力称颂康熙“功德之巍巍,既如彼文教之煌煌”^②,明确揭示了康熙帝推崇唐诗的文治象征意义。

编纂唐诗,推崇正声

历代帝王标榜文治的举措之一,就是编纂大型典籍。唐太宗如此,康熙帝也是如此。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宫廷刻书的规模更为宏大,复制更加方便,康熙帝命文臣编纂各种门类的大型丛书和总集,并通过御制序文的标签,全部转化为本朝经典。关于唐诗的整理编纂只是这种御制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康熙帝命自己的亲信曹寅统领《全唐诗》编纂工程,并在《全唐诗序》中说明:“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篇,参互校勘,搜补缺遗。”^③《全唐诗》的编纂,就像《康熙字典》等书籍一样,都借鉴了前人已有的书籍文献,组织文臣加以汇总校勘,旨在超越前人,提供一个御定的标准,最后刊刻成册。关于《全唐诗》编纂过程及文献价值,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此处不赘述。本文强调的是,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学习唐诗,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全唐诗》以及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选唐诗》相继完成,康熙帝最终通过编纂大型诗集和御制序文的形式,完整而明确地表述了以唐诗溯源诗教、以诗教辅助文治的政治意图,对当时诗坛起到了统一标准、协同声调的作用。

康熙帝组织文臣编纂《全唐诗》,从诗歌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唐诗代表了诗歌的高峰,树立了诗歌创作的典范。康熙帝在《全唐诗序》中指出:“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④编纂此书是为了确定一

① 《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361页。

② 陈廷敬:《御定全唐诗后序》,载《午亭文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6册,第507页。

③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163页。

④ 同上。

个不同以往的版本：“于是唐三百年诗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学者可以“博收约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则真能善学唐人者矣。”^①大学士张玉书则同声附和：“我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纶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宜旁采以成巨观，因命校刊《全唐诗》集。”^②这说明：康熙帝推崇唐诗，是为了显示一种“中和之极”的标准，对诗人的性情有所节制而不失其正，以符合盛世的气象。

然而，康熙帝推崇唐诗，还有其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提倡诗教，以诗教辅助文治。康熙帝曾在《日讲诗经解义序》中阐述这种思想：“朕尝思古人立训之意，既有政教典礼纪纲法度以维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间，鼓舞于隐微之地，使人从善远恶，而不知优游顺适而自得，则必赖乎诗”，由此感慨“教至于诗而微矣，治至于诗而极盛矣”。他将政教与诗教相提并论，希望“四海臣民”也能“偕进于温厚和平之教”。^③因此，康熙帝对唐诗的评价，自然要追溯到诗教的传统。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全唐诗》编纂完成前，康熙帝为翰林侍读徐倬所献《全唐诗录》作序，就希望“俾诵习者由全唐之诗，沿波讨澜”，追溯到诗教，可以起到“化理人心”的作用；^④而其《御选唐诗序》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其一唐诗是从《诗经》发展而来的，“自三百篇降及汉魏六朝，体制递增，至唐而大备，故言诗者以唐为法。”其二选择唐诗的标准是要符合诗教，“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⑤这就是说，凡是不符合“温柔敦厚”之风的诗歌都被排除在外。对于《御选唐诗》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给予高度评价：“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大抵各持偏见，未协中声。惟我圣祖仁皇帝，学迈百王，理研四始，奎章宏富，足以陶铸三唐。故辨别瑕瑜，如居高视下，坐照纤微。”甚至将这一御制选本比喻为孔子删诗：“譬诸古诗三千，本里闾谣唱，一经尼山之删定，遂列诸六籍，与日月齐悬矣。”^⑥这虽然是文臣的恭维之词，却也揭示了满族帝王为标榜文教而以御制方式把控文学经典话语权的政治意图。

与康熙十七年前后康熙帝初学唐诗相比，至康熙四十五年以后，康熙帝先后为三种唐诗总集作序，其论述更为完备，宗旨更加明确——提倡诗教，制定规范，使诗歌成为表达“正

①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164页。

② 张玉书：《张文贞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2册，第439页。

③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632-633页。

④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162-163页。

⑤ 圣祖御定、陈廷敬等奉敕编《御选唐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6册，第1-2页。

⑥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百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58页。

声”、宣扬盛世、辅助文教的工具;对不符合要求的诗歌(“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予以限制。《全唐诗》卷帙浩繁,成本很高,不易颁发。但《御选唐诗》只有三十二卷,在印制之后就成为康熙帝颁赐大臣的重要书籍。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曾将《御选唐诗》赐给国舅佟国维、直隶守道李维钧、真定府副将胡琨等人各一部;次年,又先后赐给总督赵弘灿、大学士马齐各一部。^①

还要说明的是,康熙帝自比唐太宗,推崇唐诗,具有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介入文人有关唐宋诗的比较及论争;从整理和保存文献的角度,也不排斥编纂其他朝代的诗歌总集,但《全唐诗》绝对处在中心地位。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在《四朝诗选序》中就说明:“近得《全唐诗》,已命儒臣校订刊布海内。由唐以来,千有余年之久,流传自昔未见之书,亦可谓斯文之厚,幸矣。遂又命博采宋、金、元、明之诗,每代分体各编,自名篇巨集以及断简残章,罔有阙遗,稍择而录之,付之剞劂,用以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譬犹六代递奏,八音之律无爽;九流并溯,一致之理同归。然则唐以后之诗,又自今而传矣。夫诗之日远而日新如此,而皆本于人之一心。”而孔子所谓“诗法也即心法也”。^②至于当时的文人对唐诗或宋诗各有偏好,私人编纂各种诗歌选本,康熙帝并没有进行干预。有关唐宋诗的比较和争论,作为文人之间一种特殊的诗歌阅读和接受活动一直延续到晚清。

总而言之,康熙帝与身边文臣通过讲读、书法、唱和诗歌、编纂诗集等形式,同声相应,大力鼓吹唐诗,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对当时文人的诗歌创作及评论、诗集编纂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考察康熙朝文人(如朱彝尊、王士禛等)对唐诗的阅读与接受情况,上述背景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但康熙自比唐太宗,效法唐代盛世,这种特殊的阅读心态,与一般文人纠结于唐宋诗之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而不宜纳入宗唐必抑宋的套路。从唐诗的阅读史来看,康熙帝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与文治相辅助,还有诸多文臣相呼应,这种传播生态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康熙年间文人阅读史研究”(项目编号:09YJA870003)阶段性成果。

(于翠玲、刘冰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 2150、2253、2295 页。

②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9 册,第 169-170 页。